

马国川名家访谈系列之一

共和国一代

马国川

访谈录

吴敬琏

推荐作序

项怀诚

郑新立

陈 元

许善达

秦 晓

宋晓梧

周其仁

樊 纲

郭树清

范恒山



华夏出版社

马国川名家访谈系列之一

共和国一代

马国川

访谈录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和国一代访谈录/马国川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9
(马国川名家访谈系列之一)

ISBN 978-7-5080-5391-2

I. 共… II. 马… III. 经济学家-访谈录-中国-现代
IV. K82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8427 号

共和国一代访谈录

马国川 著

策 划:李雪飞

责任编辑:李雪飞

出 版: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电话:64663331 转)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

装 订: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09年9月北京第1版

201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670×970 1/16 开

印 张:22.5

字 数:271千字

定 价:32.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序 言

吴敬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 60 年了。在纪念国庆 60 周年的时候，我们不妨套用列宁的话说，“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日，最好的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解决的革命任务上”。在过去 60 年中，现代中国的建设走过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期间经历过无数艰辛、动荡、摇摆与反复，既有山重水复之困惑，也有柳暗花明之转机。这是一段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的历史，研究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能为我们指明解决任务的方向。

回想 60 年前，天安门的礼炮声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 1949～1953 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曾经灾祸纵横的中国医治好战争的创伤，国民经济的面貌为之一新。这使亿万民众从心底里唱出《歌唱祖国》的歌声：“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然而，胜利也有它的阴暗方面。恢复国民经济的伟大胜利使人们滋长了虚夸冒进和高估自己能力的思想。在匆忙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建立的苏联式的集中计划体制，非但没有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热情，相反形成了毛泽东所说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局面，于是改革就提上了日程。

在半个多世纪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先后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如果按主要的改革措施来区分，可以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改革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58~1978年。改革的重点是中央政府向下属各级政府放权让利。

1957年，中国从1958年初开始了被定义为“体制下放”的“体制改革”，改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计划管理权的下放；（2）企业管辖权的下放；（3）物资分配权的下放；（4）财政权和税收权的下放；（5）劳动管理权的下放。

在保持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总框架不变的条件下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所形成的分权型命令经济体制，和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及“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一起，构成了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制度基础。在这种体制支持下，各级政府响应毛泽东“三年超英、十年超美”的号召，充分运用自己支配资源的权力，无偿调拨农民的财产劳力资源，大上基本建设项目，来完成“钢铁生产一年翻一番”之类异想天开的高指标，结果很快就爆发了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争夺资源的大战，“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三收款”的“共产风”盛行，经济秩序一片混乱。

由于经济效率大幅度下降，耗费大量资源所换得的只是一大堆为了邀功请赏而制造的虚夸数字。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号称已经完成的钢铁、粮食等生产指标，完全是虚假的。

1958年末，这种完全脱离实际、一意孤行的做法的消极后果终于显现，生产下降，大批工商企业出现亏损，生活必需品供应不足，经济陷入严重困难。

1959年“反右倾”运动导致的第二次“共产风”，使经济和社会状况进一步恶化。1959年全国共生产粮食1700亿公斤，比1958年的实际产量2000亿公斤减少了300亿公斤；1960年粮食产量降到1435亿公斤，比1951年的1437亿公斤还低，全国普遍发生饥荒。由于封锁消息和缺乏拯救措施，城镇地区广泛出现了因营养不良导

致的浮肿病，农村地区则造成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1960年秋季，中共中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恢复了由陈云任组长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采取坚决措施来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

经过几个月的调整，经济逐渐稳定下来，并在1964年大体上得到了恢复。

不过，在人们庆幸经济秩序恢复的同时，却发现集中计划经济的所有弊病又都卷土重来，于是又酝酿再次进行改革。

但是，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由于存在社会主义只能采取行政命令配置资源这样的意识形态障碍，市场取向的改革很难在政治上被接受。于是，进行向地方政府下放计划权力，几乎成了唯一可能的改革选择。因此，此后仍然多次进行过类似于1958年的行政性分权改革，例如，1970年以“下放就是革命、下放越多就越革命”为口号的大规模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就是1958年“体制下放”的重演。

1958~1976年期间的多次“体制下放”，无一例外地以造成混乱和以随后重新集中而告终。在“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循环下，形成了“放—乱—收—死”的怪圈。

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逮捕和“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转机。由于把整个社会变成牢笼和使上亿人遭到迫害，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全面专政”的制度彻底绝望，全国上下一致认为旧路线和旧体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由此形成了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变革救亡图存的共识。中国改革也进入了它的第二个阶段。

启动改革的第一项行动是解除思想禁锢的“思想解放运动”。当

时主持中共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支持《光明日报》在1978年5月11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以此为开端，全国掀起了一场以“解放思想”为基本内容的启蒙运动。“思想解放”意味着原来认为天经地义的“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之类的理论是可以怀疑的，原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济和“对党内外资产阶级（包括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面专政”的制度是可以改变的。这次运动打破了数十年僵化思想的束缚，激发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开动脑筋去寻找挽救危亡、求得发展的出路。他们认真总结自己的教训，学习他国的经验，提出了各种各样变革的设想。

至于如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大致上有两种不同的想法：

第一种是以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内容。在“拨乱反正”中，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党政领导人认同孙冶方的经济思想，认为应当把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和提高企业活力放在改革的中心地位。

另一种意见的思考范围更加宽广，认为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建立一种完全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新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例如，中国经济学界宿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中央政府经济领导工作的薛暮桥，在1980年初夏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受第一种思想的影响，四川省率先开始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接着把这一改革推广到了全国主要的国有企业。在开始的几个月内，“扩权”显著提高了试点企业职工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但

是，这种做法的消极方面也很快就表现出来。加之当时对发展工业要求过高过急，增加投资的压力很大，造成了总需求失控、财政赤字剧增、经济秩序陷于混乱的局面，使国企改革不得不停下来，因而整个国民经济也进入了新一轮的调整。

当国有企业的扩大自主权改革陷入困境以后，已经掌握实际领导权力的邓小平改变了改革的重点，从城市的国有经济转向了农村的非国有经济，其中最重大的政策转变是对农村包产到户由禁止到允许的转变。以家庭承包制度为基础的农村改革，迅速推动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当这种“存量不动、增量改革”的战略在农村取得初步成功以后，中国党政领导将这种经验推广到其他部门，逐步放开对私人创业活动的限制。加上在这之前已经开始的对外资开放国内市场，也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开拓出一定的空间，使非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得以自下而上地发展起来。

十余年的增量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高速增长。在 1978～1990 年的十二年中，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4.6%，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13.1%。

实行增量改革战略，在大体维持国有经济现有体制的条件下，容许私有经济发展和引入部分市场机制，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命令经济和市场经济、“调拨价格”与市场价格双轨并存的状态。

“双轨制”制度安排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正像前面一些学者所说的，它给民间创业活动一定的空间，使各种类型的民营企业得以成长；另一方面，如果这种被定义为“权力货币化”或“权力资本化”的制度安排持续下去甚至得到加强，那么就会造成广泛的寻租（rent-seeking）环境，埋下腐败蔓延的祸根。而如果不能及时地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铲除这一祸根，

则有可能助长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酿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

这样，“双轨制”就把两条可能的进一步发展道路摆在中国的面前：一条是坚持改革，建设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强化寻租基础，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

由于存在这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这些年来就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规范的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并促成了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时，虽然出现了某些局部性的不公正行为，但满意的声音仍然占有优势；反之，当进一步的改革受到阻碍，官员的权力扩张和对经济的干预得到加强时，就会导致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扩大，造成腐败活动加剧、贫富差别进一步扩大、大众不满的情绪滋生的态势。

为了克服双重体制胶着对峙造成的种种弊端，1986年国务院制定了价、税、财、金、贸五个方面的配套改革方案，并准备从1987年初开始实施。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为进行“党政分开”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很可惜这两项改革都没有能够进行下去。接着发生的1988年的经济风波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使改革受到了挫折。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后掀起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新高潮，使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整体推进的新阶段。

首先，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市场的价格全面放开，市场活跃，“官倒”商品寻租的空间大幅度地被压缩，腐败被抑制，大众对改革的推进十分满意。

从1994年初开始，根据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财税、银行、外汇管理等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企业改革从放权让利转向制度创新的决定，也为国有企业改革确定了正确

的方向。

1997 年的中共十五大在产权改革方面取得了突破。十五大明确宣布，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至少一百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代表大会要求根据“三个有利于”的原则调整和完善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包括三项主要内容：（1）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国有资本要从非关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退出；（2）寻找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发展多种形式的公有制；（3）明确宣布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的发展。

在往后几年中，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一些重大的进展。

第一，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主要表现在：（1）国有企业已从国有独资的产权结构，变为以股份多元化的公司制企业为主。绝大多数国有二级企业已经改组为国家相对或绝对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在金融类企业中，21 世纪初实现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海外整体上市，为中国金融市场提供了必要的微观基础。（2）这些公司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搭起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

第二，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明显优化，从国有经济一家独大的结构转变为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的结构。除少数垄断行业外，民营经济一般居于主要地位；在就业方面，民营企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体。首先在沿海地区，然后在许多其他省份，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

由于市场化改革的进展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的形成，中国经济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迅速发展，到 21 世纪初，中国已经被世界公认为保持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虽然在 20 世纪末建立起了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是市场经济的若干重要架构，例如规范的金融市场、现代市场经济所

必需的法治体制，并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说，距离原来确定的经济改革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有鉴于此，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不过，这一决定的执行不是没有阻力和障碍的。

首先，当国有经济改革改到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重要行业的国有垄断企业时，改革步伐就明显慢了下来。在某些地方的国企改革中，还出现了改革遭到扭曲、“掌勺者私占大锅饭”的权贵私有化的现象。所有这些，都使民怨沸腾。近年来，围绕重要行业中国有企业究竟应当“进”还是应当“退”的争论又起。有些论者提出，在这些行业中，国有经济的比重不但不应当降低，而且还应当提高。2004年以后，社会上开始出现了被媒体称为“再国有化”或“新国有化”开倒车的现象。

第二，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有所加强。从2003年四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现象。在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判断时，主流意见却把问题的性质确定为“局部过热”，采取的主要措施也是由主管部委联合发文、采用审批等行政手段，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过热行业”的投资、生产活动进行控制。从那时起，各级政府部门纷纷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了对企业微观活动的干预和控制，使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大为强化，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则遭到削弱。

第三，政治改革滞后。邓小平在1980年发动全国农村承包制改革的同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著名的“八一八”讲话，启动了政治改革。1986年他又多次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难于贯彻，要求加快政治改革。不过，这两次改革都没有能够进行下去。邓小平逝世以后，新一代领导人在追悼会上再次提出政治改革的问题。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的口号，“十六大”又重申了这一主张，而且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但是，十年来进展十分缓慢，例如《物权法》、《反垄断法》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都用了十三年的时间才得以出台。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认基本正义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于是，就出现了从事寻租活动的“新动力”，“买官卖官”的活动开始盛行起来。

寻租活动基础的扩大使腐败活动日益猖獗。根据1988年以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中国租金总额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年绝对额高达40 000~50 000亿元。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中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面对这种形势，人们提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

支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改革的人们认为，既然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公是由市场化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活动干预压制等寻租活动基础所造成的，那么根本解决之道就只能是坚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法治化的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

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决方法，这就是回到1976年以前极“左”路线支配下的旧体制上去。一些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在这场争论中发表演讲，印发书刊，组织“学习”，极力鼓吹目前我们遇到的种种经济和社会问题，从腐败猖獗、分配不公直到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等，都是由市场化改革造成的，由此鼓动扭转改革开放的大方向，重举“阶级斗争为纲”

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七八年再来一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实现“对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改革开放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支持者对中国现状所作的这些主张，不论就他们的“诊断”还是就他们的“处方”来说，都是不正确的。

如果说他们对中国社会问题所作的“诊断”属于“误诊”，那么他们开出的“处方”，即回到“全面专政”时代，就更是南辕北辙了。我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于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加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强政府及其官员不受约束的“专政”权力，不正是适得其反并进而更加强化腐败的制度基础吗？

中国是否能够在未来的岁月中续写辉煌，将取决于我们能否根据过去60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正确应对新一轮的挑战。

最近，青年记者马国川采访了10位出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有深厚学术修养的经济学家，结集为《共和国一代访谈录》一书出版。访谈围绕着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成长展开，在共和国60年历史的背景下展开了一代人的生活历程。从一代人成长的轨迹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60年间国家走过的艰难历程，可以看到30年间改革走过的不平凡道路，而且也可以为今后的改革寻找到仍然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在改革处于非常复杂的局面下，这些思想资源是非常可贵的，它们是穿越历史的烛光，可以帮助人们认清未来的道路。好几代中国人为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中国而努力奋斗过，然而屡屡遭遇挫折，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平坦。推进改革防止倒退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人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有半点犹疑，只有打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走上坦途。

目 录

项怀诚

改革是共和国财政六十年的主线 / 1

郑新立

亲历改革开放和经济转轨的过程 / 37

陈 元

做一个真正的银行家 / 71

许善达

见证中国财税体制的改革 / 101

秦 晓

追问中国的现代性方案 / 137

宋晓梧

在理论观点上，我从来坚持独立己见 / 163

周其仁

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 / 201

樊 纲

中国的转轨经济学 / 233

郭树清

“中国道路”需要再来一个三十年 / 273

范恒山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 311



项怀诚

改革是共和国财政六十年的主线

「项怀诚」人物简介

男，1939年生，江苏吴江人。山东大学中文系汉语语言文学专业毕业，1960年参加工作。1963年1月进入财政部，历任财政部税务总局科员、财政部预算司科员、副科长、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副处长、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副司长。1986年至1994年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94年至1998年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党组书记（部长级）。1998年至2003年任财政部部长。2003年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理事长。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国家行政学院、财政部科学研究所兼职教授。中共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

从山东大学到财政部

马国川：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一共是十任财政部长，您是第八任部长。

项怀诚：前三任都已经不在了。第一任是薄一波，担任了三年的财政部长，1952年因为“新税制”改革受到毛主席的批评，然后由邓小平同志兼任财政部长。当时邓小平刚从西南军政委员会调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只兼任了一年财政部长，就由李先念同志接任了。

马国川：李先念先后当了二十一年的财政部长，是时间最长的财政部长。

项怀诚：这三位都是国务院副总理兼任财政部长，所以他们都不在财政部办公。邓小平同志的办公室我不知道，李先念同志的办公室是在国务院。第四任部长是张劲夫，第五任是吴波。吴波从1952年起就一直是财政部副部长，后来他长期担任常务副部长，主持财政部日常工作。第六任是王丙乾。我们这茬人都是在劲夫、吴波、丙乾同志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